

研究論文

機構的風險責任與公共論述 ——傳媒呈現香港滙豐控股負面消息的 個案研究

陳智傑

摘要

社會風險似乎無日無之——由涉及人類命運的氣候變化、核能及輻射問題，到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安全或投資失利。有社會學家嘗試以「風險社會」理論去解說上述現象：原本為人類提供安全和便利生活的制度和機構，正反過來為我們帶來越來越多意料之外、影響更大的風險。不過社會對風險的意識，卻不一定必然與制度或機構的風險責任有關，因為社會風險意識涉及公共論述的詮釋爭論：不同持份者和專家對社會現象的演繹、新聞行業的運作及社會現存的一些普遍看法，都影響了公共論述對社會風險，尤其是制度與機構的風險責任的呈現。本文以香港傳媒論述如何呈現有關香港一所上市公司——滙豐控股的負面消息，探究社會風險意識在甚麼情況下，會扣上機構和制度的風險責任問題。

關鍵詞：風險意識、風險社會、風險責任、傳媒論述、可見性、金融海嘯

陳智傑，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興趣包括風險傳播、政治傳播及民意研究。電郵：fatkit2000@gmail.com

Research Article

Risk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Negative News on HSBC Holdings

Chi Kit CHAN

Abstract

Society is exposed to various risks: global threat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nuclear crises and daily vulnerability to food safety and investment failures. Sociologists coined the term “risk society” to capture the endless risks faced by human beings. Social institutions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re ironically the origins of new, unintended, and less controllable risks. Social risk consciousness, however, is not essentially tied with the accountabilit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owing to discursive contestation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Expert opin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by stakeholders, media, and prevailing cultural perceptions are all variable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risk and risk causation is contemplated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and hence who is accountable.

Focusing on a case study—negative news about HSBC Holdings (a listed company in Hong Kong, hereafter HSBC)—this article aims to unravel under what conditions risk accountability is pertinent for social institutions in public debat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that began with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in 2007, HSBC is a trans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 that was not exempt from the resulting credit crunch worldwide.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remain controversial, as does the attribution of the risk accountability of related business difficulties. Both were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s in the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stakeholders and other parties involved. Through content and qual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negative news about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of HSBC is scrutinized and HSBC’s business risks and attribution of affiliated risk accountability are examin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high visibility of HSBC as a news source in the media discourse was a pivotal factor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its business risks and hence the allocation of risk accountability. HSBC's presence and reading of its own business situation substantially shaped the news angles of media coverage and set significant parameters for the local expert community. Comparatively speaking, media representations became more diverse when HSBC kept silent about all speculation about its business, and pluralistic news angles, news sources, and contested expert opinions strikingly diluted the issue of risk accountability in the media discourse. The findings brought forward noteworthy considerations for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risk consciousness in two ways: the manipulation of visibility by prominent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o what extent risk perceptions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were in line with those of the private sphere in general.

Keywords: social risk consciousness, risk society, risk accountability, media discourse, visibility, financial tsunami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an, C. K. (2011). Risk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Discourse—A Case Study of Negative News on HSBC Holding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187–214.

Chi Kit CHAN (Ph.D. candidate). Divis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risk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studies

導言

人類社會面對的風險無日無之，其中部分往往牽連甚廣，讓整個社會惶恐不安、爭議不斷：地震海嘯、氣候變化、核能及輻射問題、食物或產品安全(例如大陸的毒奶粉事件)和波及全球經濟的金融海嘯。這些足以使社會憂慮的風險，部分屬天災和意外，部分顯然是人禍，但亦有相當部分會涉及風險責任的論述爭議。而即使風險被界定為人禍，亦不代表風險責任的爭議便告一段落：金融海嘯顯然是金融制度所衍生的「人禍」，但誰要負責？誰的責任較大？是美國華爾街一眾投資銀行和銀行家，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貨幣政策，過份依賴借貸消費和置業的美國民眾，還是公共財政紀律鬆散的部分歐洲國家？

在風險意識的形成過程中，公共論述中經常會出現對風險成因及應對方法的爭議。這爭議會直接影響大眾對風險責任誰屬的判斷，而傳媒則是承載這些論述爭議的平台。所以，傳媒留意那一種社會風險、新聞工作者如何報道和跟進有關社會風險的事件、以及不同類型的專家和持份者對事件的詮釋，都可能會影響市民如何理解風險成因，責任和應對方法。故此公共論述的討論和詮釋，可能會使公眾對風險產生巨大反應、大力責怪個別機構或某種科技，但亦可能使公眾對風險淡然視之(Kasperson et al, 1988; 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社會的風險意識及情緒是如何在公共論述中形成，並如何牽連到個別機構的風險責任，是本文所關心的研究問題。

下文將首先闡述有關風險意識和風險責任的文獻回顧，及其與公共論述之間的關係，其中亦會提出分析形成風險意識的理論框架。接著，本文會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並按理論框架疏理研究個案，從中探討環球金融風險是如何、及在甚麼條件下被扣上到跨國企業本身的風險責任問題。在文末，我們會討論研究發現的理論含義和本文的研究局限。

文獻探討

風險源自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這些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影響 (Beck, 1992; Giddens, 1990, 1991)。當然，人們會借助專家的知識和意見、社會制度的保障、及個別機構提供的專業服務，嘗試減少不確定性、制訂應對方法、甚至預測不同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以求把風險控制在可接受、可預見的範圍內 (Giddens, 1990; 1999)。然而，這些專家、社會制度和機構之所以能發揮風險管理的功能，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社會的信任 (social trust)：機構和專家知識的公信力，是風險管理制度能否持續下去的重要因素 (Giddens, 1990, 1991, 1999)；假如無法得到社會信任，以上機構和專家所訂立的制度，將難以發揮讓人們迴避風險的功能。

現代社會中人們對專家知識 (包括科學知識)、風險管理制度和機構的信任出現動搖，正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重要觀察之一 (Beck, 1992)。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認為，原本用來管理風險的現代社會制度，正為我們帶來越來越多、難以預測的意外效果，反而讓社會面對更多風險，並影響人們對這些制度的信任 (Beck, 1992)。金融制度原本是為了管理跨境、跨時域的交易，便利全球經貿往來；但其本身一旦失效，所牽連和引發的問題卻會波及全球，動搖人們對個別金融機構以至是監管當局有信心。

不過 Beck 亦認為，公眾未必會理所當然地留意到這些制度失效時所產生的新風險：一來，專家學者間對有關制度失效的研討，與大眾對風險的認知未必一致；二來，傳媒對風險的呈現，涉及不同持份者的論爭，故此亦未必會反映制度失效的風險問題 (Beck, 1992)。其實，不少有關社會風險意識的實證研究，亦指出公共論述對風險的呈現，未必與專家學者及科學數據對風險的理解一致，以致公眾對風險或是顯得異常敏感甚至歇斯底里，或是顯得不太關心 (Kasperson et al, 1988; 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究其原因，大多與三項因素有關：傳媒的運作及如何呈現社會現象、社會各持份者的互動及其政治經濟力量、與及社會的文化處境 (context) 中的一些廣受接受的想法。下文將詳細闡釋每項因素，及其與社會風險意識的關係。

大眾的風險意識的建構與公共論述(尤其是當中的傳媒論述)如何呈現社會現象息息相關。傳媒是讓人們感知社會、了解日常生活經驗以外的世界的主要渠道(Lippmann, 1922/1997);而新聞則是一種讓人們了解社會發生了甚麼重要事情的知識(Park, 1940)。在這基礎上,美國學者Zaller(2003)援引社會學者Michael Schudson(1998)的「監測性公民」(Monitorial Citizen)概念,指出民主社會的良好運作,有賴傳媒能否適時地為社會響起警報,喚起民眾的注意、提醒他們社會出了甚麼問題。不過,傳媒和新聞行業亦有自己的運作邏輯及價值判斷:何為新聞價值(newsworthiness)、如何把新聞分類、新聞編採及表達的慣性操作(如平衡報道、客觀中立、時效性、人性趣味等)(Tuchman, 1978; Schudson, 2000, 2003; Gamson, 1988; Gilton, 1980)。因此,事件要成為為社會所認知的風險,最基本的條件是要符合傳媒運作和新聞編採的常規,才有機會具有新聞價值、受到社會關注(salience),繼而醞釀成為喚起社會風險意識的警報,反之則可能會成為市民意識不到的事情。而不少有關風險研究的文獻,亦把風險議題被「化大」(Slovic, Flynn, & Layman, 1991; Flynn, Peters, Mertz, & Slovic, 1998; Powell & Leiss, 1997)或「淡化」(Rojecki, 1999; Winkler, 1999)的原因,歸咎於傳媒及公共論述對事件的呈現。

事件若具有新聞價值,往往會帶來「可見性」(visibility),即是人物或事件透過傳媒向公眾展現出來(Thompson, 1995, 2005)。「可見性」於大眾風險意識中有兩項含義;首先是傳媒論述與新聞消息來源的互動(Schudson, 2000, 2003)。事件能否促使傳媒響起警報,與涉及事件的持份者的政治經濟力量有關:假如涉及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團體、名人或官方機構,則事件本身已經有機會於新聞媒介「曝光」(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s, 1978; Gandy, 1982; Cook, 1998),其「可見性」亦較高(Thompson, 2005)。其次,官方、其他有力人士及團體可透過作為消息來源影響傳媒報道(Jacobs & Shapiro, 2000; Schudson, 2003),及於發生讓市民驚訝的事件後設法修補形象、減少新聞報道對事件的負面詮釋(Benoit, 1995, 1997, 2006; Bennett, Lawrence & Livingston, 2006)。不同政治經濟力量之間的互動,可促使傳媒發出社會警報(例如政府或大機構發出警示),又或反過來減少傳媒發出風險

警報的機會(例如透過發布消息策略,減低公眾對事件的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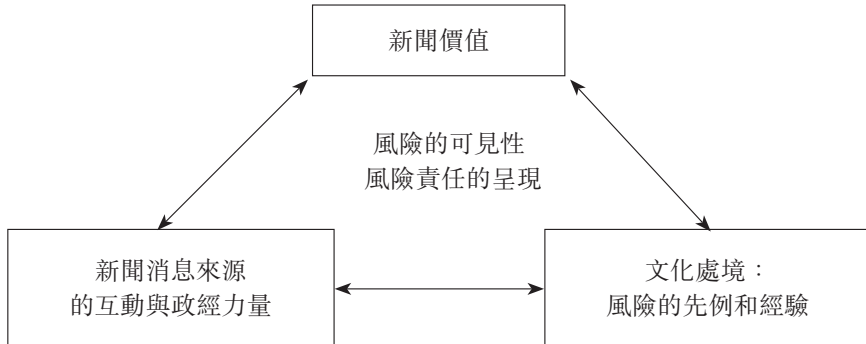
不過另一方面,「可見性」卻是一把「雙刃劍」(Thompson, 1995, 2005):它讓擁有政經力量的人物和組織得到曝光及塑造公眾形象的機會,但這些曝光機會卻同時使他們置於容易遭受攻擊的處境,成為傳媒和公眾質問的對象(Thompson, 2000, 2005)。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者基於對專業價值的追求、維護行業的公信力和新聞工作的常規壓力(每天都要找新聞、新事情),亦有挑戰權威甚至是質疑消息來源的機會(Schudson, 2008)。故此,「可見性」對大眾風險意識而言起着兩項作用:一方面,它讓社會不同持份者透過作為新聞的消息來源,嘗試介入公共論述以詮釋和定義風險。但另一方面,「可見性」卻可能使這些擁有政治經濟力量的消息來源,成為傳媒及公眾就風險問題質問的對象。

最後,社會的文化處境(context)也會影響公共論述對風險的呈現。前文有關風險呈現的爭議,正好反映出大眾對風險的定義,往往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對風險的界定(Kasperson et al, 1988; Kasperson & Kasperson, 1996);因而有時即使專家費盡唇舌,亦無法平息公眾恐慌(Powell & Leiss, 1997)。箇中關鍵,在於人們對風險的反應,除了來自數據和資料的分析外,同時亦源自印象深刻的案例(exemplars)或對過往經驗的詮釋(Berger, 1998; Trumbo, 2002; Baesler & Burgoon, 1994; Brosius & Bathelt, 1994)。此外,公共論述對風險的呈現也與相關的機構和制度的公信力的有關(Giddens, 1990)。假如機構的社會信譽超卓,則可能會減低被輿論要求承擔風險責任的機會。

綜合文獻探討的分析,新聞價值、消息來源與傳媒的互動、文化處境(有關風險的先例和過往經驗),都對風險意識於公共論述中的形成過程——尤其是機構的風險責任息息相關。事件的新聞價值,影響了相關風險、和所涉及的持份者的「可見度」;「可見度」則為不同持份者提供了詮釋風險的機會,包括對風險成因及善後的意見,從而影響公共論述如何解讀風險責任:例如有沒有人要為風險負責?那個機構的風險責任較大?這些於公共論述的討論亦反過來影響事件的新聞價值,尤其是當有消息來源被批評要為風險負責、因而遭受傳媒、其他持份者及公眾的質問。而在上述的互動中,文化處境(有關風險的先例

和過往經驗)亦為重要部分。本文嘗試把上述探討綜合為以下的理論分析框架：

圖一：公共論述中的社會風險意識建構



本文將按以上理論分析框架，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研究案例、及分析相關研究資料的方法和取材。

研究問題、個案及研究方法

本文選取了2008年底的全球金融海嘯作為研究背景，並以香港一所十分知名的跨國上市公司——滙豐控股(下稱滙控)——作為研究案例，探討社會風險在甚麼情況下，會構連(articulate)到個別機構的風險責任。

本文選取金融海嘯作為研究背景，主因是其風險責任具有相當的爭議性，因而相關風險問題的詮釋空間亦較大，適合用來研究公共論述如何詮釋風險責任。其次，滙控是一所十分知名的上市銀行及金融服務集團，在香港以至世界金融業中舉足輕重，¹故此公共論述對滙控風險問題的呈現，往往與金融海嘯等環球經濟大氣候息息相關。最後，由於滙控的知名度很高、其動向廣為金融業界及整個香港社會注意，故此其消息頗具新聞價值，亦會牽涉不同方面的消息來源和持份者。這些元素都有助針對本文的研究問題(風險意識是如何在公共論述中形成，並如何牽連到個別機構的風險責任)作出深入和豐富的探討。本文將透過探討香港傳媒論述是如何詮釋滙控的負面消息，尤其是相關負面消息的風險

成因、及應如何善後，分析公共論述是如何解讀相關的風險責任，及在甚麼情況下會傾向把風險責任構連到滙控身上。

個案背景及具體研究問題

正如前文所述，滙控是香港十分知名的上市公司，在香港以至世界金融業中舉足輕重；故此在金融海嘯下，滙控亦無法幸免地受到牽連。在金融海嘯的蘊釀及爆發期間，香港傳媒曾經傳出過兩宗與滙控業績表現有密切關係的重要負面消息：一、於2007年2月8日，滙控於公布其年度業績前約一個月，由英國倫敦發出自創立以來的首個盈利警告，指集團的北美業務受美國次按危機（美國次按危機是金融海嘯的重要源頭）拖累；²二、於2009年3月公布業績前、金融海嘯肆虐之際，市場屢次傳出滙控因為資金短缺而需要供股集資；³而滙控亦於公布業績時正式確認及公布相關消息。由於兩次的負面消息均在滙控發表業績前於傳媒論述流傳，故此按理亦應會讓公眾意識到滙控業務正面臨風險，進而使傳媒論述對於滙控業績預期出現較為負面的呈現。故此，第一條研究問題是：盈利警告（下稱盈警）和供股集資（下稱供股）這兩項負面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使傳媒論述對滙控業績及前景的詮釋顯得較為悲觀？這條研究問題主要探究滙控的負面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使傳媒論述產生對滙控前景的風險意識。

除了有關滙控的風險意識外，本文第二條研究問題會探討這些風險意識的成因——即在傳媒論述的呈現中，對滙控前景顯得傾向悲觀的論述，主要是歸咎於何方？是歸咎於滙控本身經營不善、歸咎於金融市場的整體走勢和國際形勢、還是把風險成因詮釋為技術分析？⁴如果滙控的負面消息，會使傳媒論述把有關風險歸咎於機構（滙控）本身，則按理在傳媒論述中的悲觀看法，會把相關的風險責任構連於滙控本身的經營或領導問題等內因，多於整體市場的走勢或技術分析。

此外按本文的理論框架，新聞價值、消息來源間的互動、廣為人知的先例和與風險相關的經驗，都對風險意識於公共論述中的建構，尤其是機構的風險責任息息相關。從新聞報道的行文用字，可以分析相關報道對滙控負面消息的重點及切入點，探究新聞編採人員是如何

詮釋相關的負面消息。另外，報道中所引用的消息來源及其主要觀點，都會影響傳媒論述對滙控負面消息及相關風險的詮釋；而傳媒述中所提及的案例和先例，亦可能反映香港公共論述內一些廣為接受的固有想法。這些因素都影響傳媒論述對風險責任的解讀。故此，本文另外三條的研究問題，分別為：有關滙控負面消息的新聞報道的行文用字是如何詮釋有關的金融風險？報道涉及甚麼消息來源，其對滙控負面消息的主要詮釋又是甚麼？傳媒論述對有關滙控的風險詮釋，可有提及先例、或與風險相關的經驗？

研究方法

本文會先以量化的內容分析，初步嘗試探討第一及第二條研究問題：有關滙控的負面消息在多大程度上使傳媒論述產生擔憂滙控前景的風險意識，及把風險成因歸咎於滙控本身(內因)。接著，本文會進行深入的質化文本分析，按本文的理論框架及研究問題，詳細探討傳媒論述對滙控的負面消息和相關風險的詮釋。⁵

在研究取材方面，本文挑選了在香港社會普遍被認為十分「反政府」和「反財團」的報章——《蘋果日報》，作為研究的取材對象。根據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的數據，《蘋果日報》的銷量由01年到08年均維持在每天30萬份之上(蘇鑰機，2009)，是對香港社會甚有影響力的傳媒機構之一；其「反對派」的立場在一眾香港傳媒中亦較為鮮明，每每都對社會各界——即使是政府和有勢力財團，亦會作出尖銳批評。

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傳媒論述如何針對風險發出「警報」及有關風險責任的詮釋，故此在取材上，應挑選一些被社會普遍認為報道及言論最尖銳、最無懼權貴的傳媒，才適合用來觀察傳媒發出社會警報的狀況；從另一面看，如果連言論最尖銳、最無懼權貴的傳媒也沒有發出社會警報和談及針對相關機構的風險責任，那更遑論其他傳媒了。⁶其次，滙控於香港社會是一個十分知名和受歡迎的品牌，亦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銀行，故此其負面消息並不只會惹起財經精英的關注：手上持有滙控股份的小股東以至是一般市民，平時亦會留意滙控的動向。故此，本文沒有刻意選取財經精英報章作為分析對象，而是

以觀察傳媒發出社會警報的研究目的，選取了言論最尖銳、最有機會發出警報的《蘋果日報》作為研究對象。

取材的時間範圍如下：

- 07年：由2月8日（報章刊登滙控發出盈警當日）到3月5日（滙控公布業績當天）的報章內容；
- 09年：由2月3日起至3月2日（滙控公布業績及供股計劃當天）的報章內容。
- 07和09年的取材時間均約為滙控公布業績前的一個月，以求時間範圍相約，增加來自兩個年度的樣本的可比性。

筆者從慧科香港新聞資料庫 (WiseneWS)，按上述的時間選取蘋果日報，並於「關鍵字」一欄內輸入「滙控」二字，以確保盡量不要遺漏與滙控相關的文章。及後筆者檢閱每篇文章（包括新聞報道、股評專欄、軟性新聞專欄），⁷並按下列四項原則選取適當的研究文本：

- 一、對滙控業績的評論和展望；
- 二、談論滙控的股價走勢；
- 三、談論大市（主要是香港股市）表現時，把走勢的原因構連於滙控的股價、業績或相關消息（例如盈警或供股）

四、列出滙控股價的資料或金融業界對滙豐控股的相關評語

四項原則均涉及新聞道報或股市評論對滙控前景的預期和展望。筆者檢閱由慧科香港新聞資料庫抽出的資料後，按上述原則挑選了以下數量的文本：

表一：取材文本數目

	2007	2009
新聞報道	30 (25.64%)	46 (37.4%)
股評專欄	85 (72.65%)	75 (60.98%)
軟性新聞專欄	2 (1.71%)	2 (1.63%)
總數 (100%)	117	123

在選取研究文本後，筆者以下列的變項把樣本分類，作為內容分析的框架：

表二：內容分析分類(滙控股價、大市及業績預期)

樂觀、審慎樂觀	好壞參半	不安、悲觀
對滙控業績、股價或大市的前景和走勢感到樂觀，又或者雖然覺得當下的表現未如理想，但長期而言仍是樂觀的。	認為滙控業績、股價或大市表現反覆不定，暫時難以預測，要謀定而後動。	對滙控業績、股價或大市表現感到不安，認為股價或大市將會下跌。

此變項在於探討在07及09年滙控公布業績前的一個月，傳媒論述整體來說對滙控的前景是較為樂觀還是悲觀？假如傳媒論述因負面消息而產生對滙控前景的風險意識，則應是較為悲觀

此外，傳媒論述的分析和預期把樂觀或悲觀的因素構連到甚麼原因，與如何詮釋有關滙控的負面消息所涉及的風險責任有關。假如把分析和預期構連到滙控的內因，則意味着傾向把風險責任構連於滙控本身。相反，假如強調外因和技術走勢，則會把讀者的注意力轉移到滙控以外的形勢，變相把風險責任「外因化」。

表三：原因/理由的歸納分析

內因	外因	其他
分析奠基於滙控的業績表現或內部事務，例如其北美業務出現問題、管理層人事變動。	分析奠基於滙控以外的因素，例如國際資金流動、整體股市表現及經濟環境、股價及股市的技術走勢。	分析時無交待原因，又或者訴諸於風水、純粹是專欄作者自己的信心等。

而文本分析方面，則會以本文的理論框架，及五條研究問題的方向，從表一的取材文本中分析傳媒論述如何詮釋有關滙控的負面消息、相關風險的成因、風險責任、及在甚麼情況下會傾向把風險責任構連到滙控身上。

研究結果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主要探究：一、在07及09年滙控公布業績前的約一個月，傳媒論述對滙控的前景是詮釋得較為樂觀還是悲觀？二、報道、股評專欄及軟性新聞專欄於分析滙控表現及股市時，是否傾向把原因歸咎於滙控的內因？

表四：2007及2009年滙控股價及大市走勢

	2007**	2009**
樂觀/審慎樂觀	19 (22%)	31 (40%)
好壞參半	10 (11%)	16 (21%)
不安/悲觀	59 (67%)	30 (39%)
不適用*	29	36
總數	117	123

Lambda = 0.131 (p = 0.016)

* 不適用：文本只載有滙控股的股價資料，並無論及滙控股價的走勢、又或論及大市表現時並沒有構連到滙控（只列出滙控股的股價資料讓讀者參考）。

** 括號內的百分比，其總數並不計算「不適用」的項目——把由「樂觀/審慎樂觀」到「不安/悲觀」百分比相加，約為100%。

表五：2007及2009年滙控業績展望

	2007**	2009**
樂觀/審慎樂觀	0 (0%)	1 (12%)
好壞參半	2 (10%)	2 (25%)
不安/悲觀	19 (90%)	5 (63%)
不適用*	96	115
Total	117	123

Lambda = 0.096 (p = 0.007)

* 不適用：文本只載有滙豐控股的股價資料，並無論及有關滙豐控股的業績展望。

** 括號內的百分比，其總數並不計算「不適用」的項目——把由「樂觀/審慎樂觀」到「不安/悲觀」百分比相加，為100%。

表四及表五的資料，在Lambda測試中均顯示資料為有效(p少於0.05)，意思即是07年及09年的數據之間的差距，為有效的差距。從資料所見，在07年滙控公布業績前約一個月，傳媒論述對滙控股價、大市及滙控業績的預期，都明顯地較09年的預期悲觀。這意味著《蘋果日報》於07年滙控發出盈警時，針對滙控所發出的社會風險警報，較09年流傳供股消息時所發出的警報有力。

表六：原因/理由的分類方法(滙控股價及大市走勢)

	2007	2009
內因	53 (55%)	42 (43%)
外因	33 (34%)	40 (41%)
其他	10 (10%)	15 (15%)
總數*	96 (99%)	97 (99%)

Lambda = 0.037 (p = 0.258)

* 由於表四「不適用」的文本並不計算在內，而且一個文本有可能給予多於一個原因，故此總數不會與表四相同。

表七：原因/理由的分類方法(滙控業績展望)

	2007	2009
內因	22 (100%)	6 (60%)
外因	0	1 (10%)
其他	0	3 (30%)
總數*	22 (100%)	10 (100%)

Lambda = 0.105 (p = 0.002)

* 由於表五「不適用」的文本並不計算在內，而且一個文本有可能給予多於一個原因，故此總數不會與表五相同。

至於表六及表七，則只有表七在Lambda測試中顯示資料為有效(p少於0.05)，意思即是07年及09年的數據之間的差距，為有效的差距。換句話說，相比起09年，07年的《蘋果日報》上有關滙控業績的分析，較為針對滙控的內因。

文本分析

內容分析帶出兩個初步觀察：一、相較於09年的供股，07年的盈警使傳媒論述產生更大的風險意識（對滙控股價及將要公布的業績顯得較悲觀）；二、07年的盈警使傳媒論述較傾向把分析滙控的因素構連到滙控的內因（例如業績及管理層問題等）。究竟是甚麼原因，使這兩項有關滙控的負面消息為傳媒論述帶來不同的風險意識？接下來的文本分析，將會進一步探究內容分析中涉及的文本，嘗試梳理盈警和供股這兩項消息，是如何於傳媒論述中被解讀，相關的金融風險成因及責任又是如何被詮釋。

「破天荒」的盈利警告

07年盈警及09年供股這兩則消息，最明顯的對比是前者讓傳媒論述顯得有「吃驚」的意味。07年的盈警，由滙控於香港時間2月8日主動發出；以下是《蘋果日報》於消息發佈後翌日的報道（標題、導言及導言後的首段報道）：

滙控破天荒發盈警 貸款撥備增137億股價急瀉2.9元⁸

由於美國按揭市場壞賬問題惡化，滙豐控股(005)昨天破天荒首度發出盈利警告，⁹估計06年整體貸款撥備金額，將會比較證券界預期的88億美元，高出多達20%，即多17.6億美元(137.28億港元)，原因為02年底收購的滙豐融資按揭壞賬業務惡化。¹⁰

處事作風向來非常謹慎的滙控管理層，昨天更罕有地公開承認，滙豐融資單純追求業務增長的策略錯誤，並隨即宣布一連串補救措施，其中更涉及管理層變動。（《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

盈警消息於翌日已經惹起廣泛報道；從上文看來，報道的標題及內文都用上「破天荒」一詞——即是史無前例，前所未有的意思，再加上導言後的一段形容滙控「罕有地」公開承認自己策略錯誤，行文中明顯地表達對滙控發出盈警的錯愕。事實上，類似的用字亦見諸其後不少的相關報道，以至是部分財經專欄之中：「滙控(005)突發盈利預警，

壞賬撥備遠較市場預期為大」(署名為「海歌」的財經專欄作家，《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一直受基金及散戶捧場的滙豐控股(005)」¹¹「上周四罕有地發出盈利預警……」(熊麗萍，滙業財經集團證券部主管，財經專欄作家，《蘋果日報》，2007年2月11日)、「繼滙控破天荒發出盈警後，全美最大次級樓按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上周五指出，拖欠比率攀近五年高位，加深市場對美國樓按惡化的關注……」(《蘋果日報》，2007年2月12日)、「由於02年底收購的滙豐融資按揭壞賬業務惡化，滙控上周破天荒首度發出盈利警告。」(《蘋果日報》，2007年2月16日)、「滙豐喺(在)上個月22日嘅(的)股價曾高見145.4元，但受到滙豐融資嘅(的)按揭壞賬問題拖累，貸款撥備急增137億元，令滙控破天荒首度發出盈利警告，上周五就收報138.2元，股價至今已跌7.2元，累積跌幅約5%」(《蘋果日報》，2007年2月26日)。即使在發出盈警約一個月後、於滙控即將公布業績之際，盈警的消息仍出現於新聞報道的行文中：「罕有地發盈警的滙豐控股(005)今日收市後公布06年全年業績……」、「在破天荒發出『盈利警號』的陰霾下，滙豐控股(005)今天派發的成績表，成為近年最受關注的一次……」(《蘋果日報》，2007年3月5日)。

滙控主動發出盈警讓人錯愕，消息並於歷時約一個月的新聞報道及部分財經專欄中屢被提及。誠然，這是滙控——一所全球知名的跨國金融集團自1865年創立一百多年來首次的盈利警告，事件本身已經極具新聞價值。

此外，滙控主動發出盈警、並且「公開承認」自己「策略錯誤」，又「宣布一連串補救措施，其中更涉及管理層變動」(《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把經營不善的業務風險歸咎於自己的責任。國際知名的金融集團主動負上風險責任，除了是具有新聞價值的題材之外，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往後傳媒論述如何解讀盈利警告的消息。第一、滙控發出盈警時所提出的理據(美國按揭市場的壞賬問題惡化，集團需要作出大量相關撥備)，除了成為新聞報道的重點(見上文引述《蘋果日報》於2007年2月9日的新聞報道)外，亦成為不少財經專欄作家解讀滙控股價、業績以至是整體股市前景時所引述的重要理由：「(滙控)集團(2007年)3月5日公布去年度全年業績，若當中仍有一些非預期的呆壞

賬，又或盈利較去年底發表第三季營運數據所述的為差，股價料再試低位。」(熊麗萍，滙業財經集團證券部主管，《蘋果日報》，2007年2月11日)、「上周港股穩步回升，如非滙控(005)受撥備消息困擾急跌，恆指有條件重納升軌」(方德正，《蘋果日報》，2007年2月12日)、¹²「美股(美國股市)上周五受滙控大幅增加按揭壞賬撥備消息影響，在金融及地產類股價急跌拖累下滑落」(王冠一，《蘋果日報》，2007年2月12日)。

第二、滙控管理層於盈警消息後備受批評，成為在傳媒論述中要承擔風險責任的重要對象：「收購Household初期，¹³市場一直擔心會拖累一向信貸政策保守的滙控；亦怕容易受經濟周期影響的消費融資業務帶來龐大壞賬。不過，經管理層一一解畫……一切負面論調都被拋諸九霄。」(《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滙控一向賴以成名的金漆招牌——管理團隊及縝密管理文化，在今次盈警事件中，亦受到衝擊，從來不假外求、由內部擢升的滙控高層班子，會否再被質疑，不夠全方位經驗，駕馭傳統銀行業務以外的新興消費融資環節，集團主席一職能否再保持內部物色的傳統？滙豐融資及北美業務撤換將帥後，有關業務是否已有起色？前景如何？」(《蘋果日報》，2007年2月5日)、「一間公司管理層做咗(了)錯嘅(的)決定時，最極端嘅(的)解決方法，就係(是)更換管理層」(孫柏文，財經專欄作家，《蘋果日報》，2007年3月5日)。滙控主動發出盈警、又承認策略錯誤，亦讓自己要負上經營不善的風險責任。

雖然在傳媒論述的詮釋中，滙控要負上經營不善的風險責任，並成為香港股市(恒生指數)以至是美國股市的風險來源；但弔詭的是，傳媒論述卻同時呈現着香港社會對滙控的固有良好印象。每當提及滙控管理層時，新聞報道不時都用上「處事作風向來非常謹慎」、「優良企業管治聞名」(《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金漆招牌」、「縝密管理文化」(《蘋果日報》，2007年3月5日)等用詞。即使在發出盈警、股價應聲下錯之際，新聞報道中仍有市民表示對滙控有信心：「持有滙控股票近6年的杜先生認為，昨日股價下跌，主要是散戶心理上較為不安……他強調自己不會沽售，持滙控屬長線投資」(《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這位杜先生的「長線」投資觀點，亦得到部分財經專欄作家的認同：「如果是滙控的長期捧場客，其實也不用太理會短期的上

落……」(陳永陸,《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¹⁴「這次滙控因美國方面的問題,引致股價下挫,實在是一個趁低吸納作長線投資的良機」(譚紹興,《蘋果日報》,2007年2月9日)。¹⁵他們對於滙控「長期」表現的信心,與新聞報道中「優良企業管治」和「處事作風向來非常謹慎」等用詞相映成趣。傳媒論述中對滙控固有的企業文化及長期表現的認同,反映了滙控於香港社會的聲譽;但諷刺的是,正因滙控長久而來給予香港社會的信心,所以其發出的盈利警告,才會使傳媒論述以至是公眾出現錯愕的反應。

滙控主動發出「破天荒」的盈警,承認「策略錯誤」及「宣布一連串補救措施」,使對長久以來對滙控有信心的香港社會吃了一驚,亦使滙控所公布的消息成為傳媒論述的主要消息來源。《蘋果日報》於盈警消息後翌日的四篇報道中,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報道滙控所發布的消息詳情,並引錄證券界消息來源表達對滙控前景的擔憂:「摩根大通更明言,¹⁶按揭貸款壞賬惡化,可能影響整個美國貸款組合,預期進一步調低滙控07年盈利」,有報道更追溯滙控於02年收購美國業務,並發展至今成為集團負累的始末:「此役收購,¹⁷更將滙控前大班龐約翰的聲望推向神話……¹⁸萬萬想不到5年後,卻成為集團首次發出盈利預警的包袱」(《蘋果日報》,2007年2月月9日)。其實正如上文所言,部分財經專欄作者(例如陳永陸、譚紹興)仍對滙控的「長期」表現有信心,足見並非所有金融界人士都對滙控前景感到悲觀,但他們的意見卻絕少出現於相關的新聞報道中。由此可見,當時新聞編採的取向,可能一如公眾一樣,對滙控發出盈警感到錯愕、因此於消息來源的選取上似乎側重於深入報道滙控發出的盈警消息、追查滙控收購美國業務的始末、與及找尋消息來源解讀盈警對滙控前景有何負面影響。當然,以滙控在香港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其發出的盈利警告及相關解讀亦有相當的權威性,對新聞報道選取消息來源時的影響力,亦可能較其他消息人士為大。

各自表述的「供股集資」

相對於「破天荒」的盈警,供股消息最為不同之處,是滙控在09年3月初公布業績及供股計劃前,一直拒絕澄清有關供股的傳聞。雖然滙

控一再拒絕回應，但供股消息仍於滙控公布業績前的傳媒論述不脛而走，並成為新聞報道行文時詮釋滙控股價表現的引用材料：「隨着供股陰霾漸散，(滙控)已難再成為淡友焦點，¹⁹料可上望68元」(《蘋果日報》，2009年2月9日)、²⁰「早前市場揣測滙控將供股集資，以提高核心資本水平，傳聞令集團股價受壓，不過滙控迄今未有行動……」(《蘋果日報》，2009年2月11日)。以上兩段有關滙控的財經新聞報道，均把滙控股價的表現歸因於供股消息：由於供股消息「陰霾漸散」(意味消息不再甚囂塵上)，於是滙控股價有望上升；又或把「股價受壓」歸咎於供股傳聞。此外，也有歐洲投資銀行把供股消息詮釋為滙控所面對的經營風險：「下月(3月)2日放榜前，²¹滙控旗下(的)加拿大及馬爾他(業務)相繼公佈去年純利倒退，歐資大行德意志更落井下石，調低大笨象目標價18%，²²直言其資金充足比率處於危險水平，²³以股代息將是集團毋須大舉供股的折衷之法。」(《蘋果日報》，2009年2月21日)。「供股」和「以股代息」，兩者都是為了讓公司儘量持有現金(「供股」是讓股東出錢予公司作為資金，以股代息則以股票代替用現金支付利息和股息開支)。²⁴歐資大行德意志在新聞報道的評論中直指滙控正面對資金周轉的風險(新聞報道中的「資金充足比率處於危險水平」)，並因而可能正考慮「供股」，這詮釋無疑是把「供股」消息作為滙控出現營運風險的佐證之一。

雖然新聞報道的一些行文及部分國際投資銀行，把供股消息作為影響滙控股價和營運風險的因素；但與此同時傳媒論述亦有不少對供股消息作出正面解讀的消息來源：

敦沛金融投資研究部主管郭家耀坦言，相比被政府注資入股失去獨立性，滙控供股更可消除不明朗因素，無後顧之憂，有利股價及早見底反彈(《蘋果日報》，2009年2月24日)²⁵

相較於兩年前的盈警消息，有關供股的新聞報道明顯地出現了正面的消息來源和相關解讀：有金融界人士指滙控雖然要供股集資，但情況已較其他當時要政府出手相救的金融業同行為佳；另外，新聞報道亦有借鑑另一所香港知名銀行——渣打銀行於早幾個月前供股，但其後股價反而上升的先例。

因市場對供股行動反應正面，²⁶去年(2008年)底渣打宣佈集資後，²⁷復牌後股價反彈……²⁸滙控周一若公佈供股消息，相信本港一開市便會停牌。(《蘋果日報》，2009年3月1日)

同樣的解讀，亦見於部分財經評論專欄：

滙控(005)再度成為傳媒焦點，又是傳出滙控要供股……上一回，渣打銀行(2888)宣佈供股，²⁹股價並沒有因此而下跌，股市最擔心的是不明朗，供股就是將不明朗變成明朗。(曾淵滄，《蘋果日報》，2009年2月24日)

隨着近期多間歐美巨型金融集團先後要政府注資，再注資才可勉強繼續營運，相對上，滙控捱至今時今日，仍未向股東或政府伸手，已是相當不俗……早前渣打(2888)宣佈供股，其股價即時反應是上升而不是下跌，因此，相信滙控一旦宣佈供股，反而有利股價之表現。(譚紹興，《蘋果日報》，2009年2月25日)

當然，並非所有財經專欄都贊同曾淵滄和譚紹興的見解；不過相對07年的盈利警告，傳媒論述顯然較為兼容了對滙控的樂觀和悲觀解讀；反之於07年盈警事件中，雖然有部分財經專欄表示對滙控仍有信心，但新聞報道的行文和消息來源的重點，始終仍是滙控發出盈警的消息、滙控本身如何解說、以及探討滙控為何會面對盈利警告的風險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傳媒論述受到滙控的消息發布影響。07年的盈警是滙控主動發出，而且還親自解釋原因、承認自己營運策略出錯；由於一所國際知名的跨國金融機構主動承認風險及承擔風險責任，事件本身的新聞價值，便已經很大機會使滙控發出的消息成為傳媒論述(尤其是新聞報道)的主要消息來源，某程度上亦影響了相關風險責任的討論。

相反，滙控於09年初業績公布前，拒絕回應供股消息，但又不予以否認。於是，在欠缺了滙控作為主要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傳媒論述便要尋找其他消息來源作出分析。由於當時欠缺了滙控對自己營運狀況(是否供股)、所面對的風險以至是風險責任的「權威解讀」，其他消息來源對滙控供股一事的詮釋空間便較大。故此在滙控自己沒有「認

錯」、碰巧出現了渣打銀行供股後股價上升的先例、再加上滙控一向是香港十分知名的老牌銀行，傳媒論述亦較兩年前的盈警事件，出現了較多對滙控的正面解讀：

早在40多年前已投資滙控的香港醫學會上周開會，醫學會會長謝鴻興回應本報查詢稱，該會投資小組已就滙控供股召開會議，各董事原則上同意參與供股……（《蘋果日報》，2009年3月2日）

這段新聞在報道香港醫學會——一個在香港享負盛名的專業醫學團體考慮是否參與滙控的供股行動時，刻意提到他們「早在40多年前已投資滙控」，與上文提及的「長線」投資如出一轍，意味著滙控仍是值得「長期」投資的股票，就連專業團體亦對滙控有信心。在對供股的解讀正反意見不一下，莫說是風險責任，就連供股本身是否意味滙控面臨營運風險，也未必有一致的說法。

總結與討論

從文本分析可見，滙控對自己營運狀況的消息發布和解讀，影響了傳媒論述對滙控於金融海嘯下的營運風險，以至是相關風險責任的詮釋。盈警和供股兩項消息，都涉及滙控——這所全球知名、且於香港社會信譽超卓的跨國金融機構，事件本身已經具有相當的新聞價值，是故亦惹來傳媒及財經評論界持續跟進，亦意味傳媒需要找尋相關的消息來源作出解讀。滙控於07年主動承認自己有營運風險，業績將會受美國次按危機拖累，並承認「策略失誤」，順理成章地成為傳媒論述的主要消息來源，使報道和財經評論傾向呈現相關的風險意識（滙控業績出了問題、美國次按危機影響了滙控），並把風險責任構連到滙控本身（滙控管理層備受批評）。

相反，滙控於09年拒絕回應、但又不否認供股傳聞，傳媒論述在欠缺來自滙控本身的消息下，便會引用其他機構和人士的意見作出分析和揣摩，例如投資銀行、金融界人士、以至是可能會參與供股的股東（例如香港醫學會）等。由於當時欠缺了滙控對自己業務風險解讀，故此其他消息來源以至傳媒本身，對供股是否意味著滙控在金融海嘯

的影響下出現營運風險，便較有空間提出不同角度的理解(德意志銀行認為滙控的資金充足比率處於危險水平，但有香港財經界人士則指滙控的情況，已較其他需要政府注資的同行為佳)。文本分析的結果，亦解說了內容分析的發現：為何07年的盈警較諸09年供股消息，更能惹起傳媒論述擔心滙控的營運風險，與及傾向把風險責任歸因於滙控本身的「內因」。

除了新聞價值和消息來源的因素外，文化處境亦與風險意識於公共論述內的蘊釀關係密切。公眾以至傳媒本身對滙控於07年發出盈警及承認策略錯誤感到錯愕，及部分財經界人士和滙控股東於09年對滙控打算供股的正面解讀，都與滙控於香港社會長久而來建立的信譽有莫大關連。

另一值得深思的研究發現，是相較於07年的時候主動發出盈警，滙控於09年初公布業績前拒絕回應供股傳聞，是否算得上是避免了於公共論述中被認定要承擔風險責任？誠然滙控的沉默，使傳媒要依靠其他持有不同立場、對滙控是否受金融海嘯衝擊看法不一的消息來源；加上滙控於香港社會的良好信譽，的確使傳媒論述對滙控於金融海嘯所面對的風險，曾經呈現了莫衷一是看法，更遑論討論滙控的風險責任。不過，當滙控其後公布業績及供股計劃的詳情後，社會輿論卻大為震驚，批評滙控及其供股計劃的聲音亦此起彼落。³⁰ 機構有多大程度上可以透過操控本身的「可見性」(主動發出消息或拒絕回應傳聞)去影響公共論述形成風險意識、及有關風險責任的討論，是風險研究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

不過，本文有兩項主要局限：一、只選用報章文本作為分析對象，未能捕捉電子媒體和其他新媒體對滙控負面消息的詮釋；二、公共論述或許未能完全反映受眾對滙控負面消息的解讀。受眾對風險及相關風險責任的關注和理解，是否與公共論述的呈現相近？受眾的風險意識，與公共論述如何互動？與受眾互動性較強的新媒體，對社會風險的呈現會否與報章等傳統媒體有所不同？這些與社會風險意識相關的題材，都值得於將來進一步研究。

註釋

1.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滙豐控股的市值約為2,007億美元，全球排行第三。資料來源：中國工商銀行調查(載於香港：東方日報，2010年1月7日)。
2. 次按危機，是指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次級按揭貸款是客戶還款能力較差、貸款質素較低的按揭融資。自2006年起，美國次按市場陸續出現斷供潮(即客戶無力償還按揭欠款給金融機構)，直接使滙控的北美業務錄得大幅虧損。
3. 供股，即是一所上市公司向所有持有股份的人——無論是大股東和小股東「要錢」(例如每持有五股，便須要額外多買兩股)，集資應付公司的財政需要。在處於金融海嘯等不利形勢下供股，多數會被解讀為上市公司的資金周轉出現緊張，亦是讓小股東頗為不悅的一步，因供股會讓他們處於兩難之地：供，則變相被「強迫」多買股票；不供，則自己的股東應佔權益會被攤薄(自己的股份數目不變，但其他供股的人的股份數目增多，自己的股東權益便會減少，日後股息收入會被攤薄)。
4. 技術分析，是指分析股價走勢時，主要以金融行業的專門數據和術語(例如市盈率、市賬率等)及相關的圖表(例如股價在上升一段時間後，升勢差不多要停，因為其數據上有關曲線的弧度快要轉向了)來解說。這類分析較少談及公司本身的表現，又或市場的整體氣氛。
5. 由於大部分有關本文理論框架的研究問題，與及有關「盈警」和「供股」這兩個負面消息的詮釋，主要還是會透過文本分析來處理，故此內容分析部分只會作為輔助文本分析的試驗工具。因此，本文的內容分析並沒有進行信度訓練及信度測試，望讀者見諒。
6. 除《蘋果日報》外，《信報》及《南華早報》亦是在香港被認為較會作出尖銳批評的報章，而且亦廣為財經精英所讀。不過，《南華早報》於2000年發生「林和立事件」——經常尖銳批評北京當局的中國事務評論員林和立離職，使社會對《南華早報》的立場有所懷疑(Ma, 2007: 175–176)。另一方面，於2006年底，香港富豪——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澤楷收購了《信報》百份之五十的股權，亦使公眾擔憂《信報》的獨立性(Fung, 2007)。
7. 軟性新聞專欄，是一些以嬉笑怒罵手法或日常生活點滴趣味來談論新聞事件的欄目。例如《蘋果日報》一個署名為「溫敏妮」的財經欄目(敏妮，Money的諧音)，便以一些閒談對話、生活經驗，而未必是財經數據和消息來評論滙控的負面消息。
8. 撥備(provision)是指公司為可能出現的呆壞賬作出的預備金額，因而影響盈利表現。

9. 005是滙控於香港的上市編號。
10. 滙豐融資當時是滙控於美國的分公司。
11. 散戶是廣東話俚語，個人投資者的意思，通常指投資額相對較小的投資人士；捧場是廣東話俚語，支持的意思。
12. 恒指，是恒生指數，反映香港股市指標的主要數據。
13. Household本來是美國一所從事金融業務的公司，於2002年被滙控收購。
14. 「上落」，指的股價的起跌。
15. 「趁低吸納」是香港財經界的術語，意思是若對該股票的長遠表現有信心，則每次其股價下跌時，便是買入的時機。
16. 摩根大通是一所國際投資銀行。
17. 收購的意思是指滙控於02年收購了美國的按揭市場業務。
18. 大班，香港社會的用語，指大銀行的領導人。
19. 淡友，香港財經術語，指看淡股市或某隻股票前景的投資者。一般來說，「淡友」意味著會把目標股票「沽空」——即是拋售目標股票、或於期貨市場上拋售該股票的買賣合約。
20. 上望，香港財經術語，指股價有機會上升到的水平。
21. 放榜，指滙控公布業績。
22. 大笨象，是香港財經界用以形容滙控的比喻，意思指滙控的市值很大，其股價走勢對於香港股市的起跌十分重要。目標價，指投資銀行或證券行對於某集股票的價格走勢預測——預測股價將會到達甚麼水平。調低目標價18%是指預期股價將較目前價格下跌18%。
23. 資金充足比率，是衡量公司持有的資金水平是否安全的標準，以判斷公司是否有充足資金在手而不會有資不抵債的問題。
24. 股息，指上市公司每年派發給股東的回報金額。不過，公司有權自行決定該年度是否發放股息，或以甚麼形式發放。
25. 見底反彈，香港的財經術語，指股價出現停止下跌、改為上升的轉捩點。
26. 這句的「供股」，指的是另一所銀行——渣打銀行於滙控公布業績前的供股行動。
27. 渣打：渣打銀行，另一所於香港的知名銀行。
28. 反彈：股價停止下跌，並且上升的意思。
29. 2888渣打銀行的香港上市編號。
30. 例如：香港著名專欄作家林行止便有言：「股民有情滙豐無義」（《信報》，2009年3月9日）；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林本利則指「滙豐管理層應自行了斷」（《明報》，2009年3月4日）；連平時絕少評論財經事

務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也感言到：「(香)港人太信滙豐了」(《信報》，2009年3月19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蘇鑰機 (2009)。〈免費報紙對香港讀者市場的影響〉。《傳媒透視》，第76期，2009年5月號，頁6-8。
- So, C. Y. K. (2009). Mian fei bao zhi dui xiang gang dou zhe shi chang de ying xiang. *Chuan Mei Tou Shi, Vol. 76*, pp. 6-8.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esler, E. J., & Burgoon, J. K. (1994). The temporal effects of story and statistical evidence on belief chan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582-602.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nnett, W. L. (2003). The burglar alarm that just keeps ringing: A response to Zall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131-138.
- Bennett, W. L., Lawrence, R. G., & Livingston, S. (2006). None dare call it torture: Indexing and the limits of press independence in the Abu Ghraib Scand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 467-485.
- Benoit, W. L. (1995). *Accounts, excuses, apologies: A 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enoit, W. L. (1997). Image restoration discourse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3*, 177-186.
- Benoit, W. L. (2006). Image repair in President Bush's April 2004 news conferenc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2*, 137-143
- Berger, C. R. (1998). Processing Quantitative data about risk and threat in news repor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 87-106.
- Brosius, H. B., & Bathelt, A. (1994). The utility of exemplars in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48-78.
-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ok, T. E. (1998).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uglas, M. (1997). The depoliticalization of risk. In R. J. Ellis & M. Thompson (Eds.), *Cultural Matters* (pp. 121-132).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Flynn, J., Peters, E., Mertz, C. K., & Slovic, P. (1998). Risk, Media, and Stigma at Rocky Flats. *Risk Analysis, 18* (6), 717-727.
- Frewer, L. J., Miles, S., & Marsh, R. (2002). The media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 Evidence in support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Risk Analysis*, 22 (4), 701–711.
- Fung, A. Y. H.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 159–171.
- Gamson, W. A. (1988).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219–244.
- Gandy, O. H.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 Giddens, A.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9).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Books.
- Giddens, A. & Pierson, C. (1998). *Conversation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to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assner, B. (1999). *The culture of fear: Why Americans are afraid of the wrong th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egory, R., Flynn, J., & Slovic, P. (1995). Technological stigma. *American Science*, 83, 220–223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T.,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Habermas, J. (1962/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Jacobs, L. & Shapiro, R. (2000). Crafted talk and the loss of 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 In *Politicians don't pander* (pp.27–7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sperson, R. E & Kasperson, J. X. (1996).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Challenges i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545 (1), 95–105.
- 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S., Emel, J., Goble, R., Kasperson, J. X., & Ratick, S.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 (2), 177–187.
- Lippmann, W. (1922/1997).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Ma, N. (2007).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State, politica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Park, R. E. (1940).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669–686.
- Patterson, T. E. (2003). The search for a standard: Markets and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139–143.
- Pidgeon, N., Henwood, K., & Maguire, B. (1999).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s: Present knowledge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P. Bennet and K. Calman (Eds.), *Risk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health* (pp. 65–7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well, D. & Leiss, W. (1997). *Mad cows and mother's milk*.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Rojecki, A. (1999). *Silencing the opposition: Antinuclear movement and the media in the cold war*.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chudson, M. (1998). *The good citizen*. New York: Free Press.
- Schudson, M. (2000).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again).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 (pp. 175–200). Hillsdale, NJ: LEA.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Schudson, M. (2008). *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lovic, P., Flynn, J. H. & Layman, M. (1991). Perceived risk, trust,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aste. *Science*, 254, 1603–1607.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umbo, C. W. (2002).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risk perception: An adaptation of 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 367–382.
- Tuchman, G. (1978). The news net. *Social Research*, 45 (2), 256–266.
- Willis, J. & Okunade, A. A. (1997). *Reporting on risks: 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health and safety communic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 Winkler, A. (1999). *Life under a cloud: American anxiety about the atom*.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Zaller, J. (2003). A new standard of news quality: Burglar alarms for the Monitorial citize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109–130.

本文引用格式

陳智傑 (2011)。〈機構的風險責任與公共論述——傳媒呈現香港滙豐控股負面消息的個案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5期，頁187–214。